



中外文学交流史

钱林森 周宁 主编

中国—葡萄牙卷

姚风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外文学交流史

钱林森 周宁 主编

中国—葡萄牙卷

姚风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 - 葡萄牙卷 / 姚风著. -- 济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8-8492-6

I. ①中… II. ①姚… III. ①文学—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葡萄牙 IV. ①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2847 号

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 - 葡萄牙卷

钱林森 周 宁 主编
姚 风 著

总 策 划: 祝 丽
责任编辑: 祝 丽
装帧设计: 王承利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 82092664 传真: (0531) 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济南大邦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19 印张

字 数: 31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8492-6

定 价: 49.00 元

总序

—

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传统最丰厚的领域，前辈学者开拓性的建树，大多集中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如范存忠、钱锺书、方重等之于中英文学关系，吴宓之于中美，梁宗岱之于中法，陈铨之于中德，季羨林之于中印，戈宝权之于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等等。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前后两个高峰，世纪前半叶的高峰，主要成就就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20世纪后半叶，比较文学在新时期复兴，30多年来推进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支撑领域，同时也是本学科取得最多实绩的研究领域，依旧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所获得的丰硕成果，被学术史家视为真正“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的特色和成就”¹，成为我国比较文学复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²。

1. 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前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 王向远教授在其28章的大著《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中，从第2章到第10章论述国别文学关系研究，如果加上第17、18“中外文艺思潮与中国文学关系”、“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总体研究”两章，整整占11章，可谓是“半壁江山”。

学术传统是众多学者不断努力、众多成果不断积累而成的。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已有三套丛书标志其阶段性进展。首先是乐黛云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中的《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严绍璁著）、《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乐黛云教授和这套丛书的相关作者，既是继承者，又是开拓者。他们继承老一辈学者的研究，同时又开创了新的论题与研究方法。

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推出《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10卷集，乐黛云、钱林森主编，花城出版社），扩大了研究论题的覆盖面，在理论与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再其后就是经过20年积累、在新世纪初密集出现的三套大型比较文学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10卷集，钱林森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乐黛云主编，北京出版社）、国别文学文化关系丛书《人文日本新书》（王晓平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这些成果细化深化了该研究领域，在研究范式的探究和方法论革新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带动了整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从“20世纪中国文学

的世界性因素”的讨论，到中外文学关系探究中的“文学发生学”理论的建构；从中外文学关系的哲学审视和跨文化对话中激活中外文化文学精魂的尝试，到比较文学形象学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所有这一切探索成果的出现，不仅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深入发展，反过来对中外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有了问题视野与理论方法的启示。

二

在丰厚的研究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外文学交流研究，成为学术史上的一项重要使命。2005年7月初，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与山东教育出版社在南京新纪元大酒店，举行《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首届编委会暨学术研讨会，正式启动大型丛书《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编写工作，以创设一套涵盖中国与欧洲、亚洲、美洲等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的文学交流史。

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又是关于此项研究的反思，这是学科自觉的标志。学者应该对自己的研究有清醒的问题意识，明确“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和“为何研究”。

20世纪末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一直面临着范式转型的问题，不同研究范型的出现与转换的意义在于其背后问题脉络的转变。产生自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确立时代的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就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影响研究的真正命题是确定文学“宗主”，特定文学传统如何影响他人，他人如何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并借鉴经验与技巧；平行研究兴盛于“冷战”时代，试图超越文学关系的外在的、历史的关联，集中探讨不同文学传统的内在的、美学的、共同的意义与价值。“继之而起的新模式没有一个公认的名称，但是和所谓的后殖民批评有着明显的关系，甚至可以把后殖民批评称为比较研究的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从后结构理论吸取了‘话语’、‘权力’等概念，致力于清算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尤其是其文化方面的问题。这种批评的所谓‘后’字既有‘反对’的意思，也有‘在……之后’的意思。”“后殖民批评的假设前提是正式的帝国/殖民主义时代已然成为历史。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这一点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当时不同政治阵营能够加之于对方的最严厉的谴责莫过于此

于‘帝国主义’了。这种共识是后殖民批评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先决条件。”¹

1. 陈燕谷：《比较文学与“新帝国文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4年2月24日。

伴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1970年代后期的兴起，西方比较文学界对社会文本的关注似乎开始压倒既往的文学文本。翻译、妇女、生态、少数族裔、性别、电影、新媒体、身份政治、亚文化、“新帝国治下的比较研究”²等问题几乎彻底更新了比较文学的格局。比如如陈燕谷指出：“现在也许有理由提出比较研究的第四种模式，也就是‘新帝国治下的比较研究’。……当‘帝国’去而复返……自然意味着后殖民批评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有效性。今天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比较研究必须在新帝国条件下重新界定自己的任务和方向。”陈燕谷：《比较文学与“新帝国文明”》。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就明确指出：“后殖民”用最恰当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跨文化批评，而“除此之外，比较文学已无其他名称可以替代”。³

3.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3, p. 10.

本世纪初，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工作似乎依然徘徊在突围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向和路径上。2000年，蜚声北美、亚洲理论界的明星级学者G.C. 斯皮瓦克将其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韦勒克文学讲座”系列讲稿结集出版，取了个惊世骇俗的名字《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这门学科就是比较文学。其实斯皮瓦克并无意宣布比较文学的终结，而是在指出当前的欧美比较文学的困境，即文学越界交流过程中的不平衡局面，以及该学科依然留存着欧美文化的主导意识并分享了对人文主义主体无从判定的恐惧等问题后，希望促成比较文学的转型，开创一种容纳文化研究的新的比较文学范型，迎接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挑战。⁴

4. Gayatri C.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然而，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试图颠覆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体系，却没有超越比较文学的理论前提。因为比较研究尽管关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但其理论前提却是，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是以语言为疆界的相互独立、自成系统的主体。而且，比较文学研究总是以本国本民族文学为立场，假设比较研究视野内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只不过影响研究表示顺从与和解，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强调反写与对抗。对于“他性”的肯定，依然没有着落。

坦率地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仍属于传统范型，面临着新问题与新观念的挑战。我们在第三种甚至第四种模式的时代留守在类似于巴斯奈特所谓的“史前恐龙”⁵的第一种模式的研究领域，是需要勇气与毅力的。伴随着国际学术共同体间的密切互动与交流，北美比较文学的越界意识也在20世纪末期旅行到了中国。虽然目前国内比较文学也整合了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跨越了既往单一的文学学科疆界，开掘了许多富于活力和前景的学术领域，但这些年来比较文学领域并不景气：一方面是研究的疆界在扩大也在不断消解，另一方面是不断出现危机警示与

5.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5.

研究者的出走。在这个大背景下，从事我们这套丛书写作的作者大多是一些忠诚的留守者，大家之所以继续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是因为盲目保守，而是因为“有所不为”。首先，在前辈学人累积的深厚学术传统上，埋头静心、勤勤恳恳地在“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领地里精心耕作，在喧嚣热闹的当下，这本身就是一种别具意味的学术姿态。同时，在硕果纷呈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外文学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基础但又重要的问题，不断引起关注，不断催生深入研究，又不断呈现最新成果，正如目前已推出的这套丛书所展示的，其研究写作不仅在扎实的根基上，对中外文学交流史的论题领域有所拓展，在理论与方法探索上也通过积极吸收、整合其他领域的成果而有所推进。最后，在中国作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关键历史节点上重新思考中外文学关系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科自觉。这事实上是一个如何在世界文学图景中重新测绘“中国文学”的问题，也即当代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中重新创造自己的身份和位置。通过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我们可以重新提炼和塑造中国文学、文化的精神感召力、使命感和认同感，在当代世界的共同关注点上，以文学为价值载体去发现不同文化之间交往的可能和协商空间，进而参与全球新的世界观的形成。

三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就学科本质属性而言，属实证范畴，从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内部分类和研究范式来看，归于“影响研究”，所以重“事实”和“材料”的梳理。对中外文学关系史、交流史的整体开发，就是要在占有充分、完整材料的基础上，对双向“交流”、“关系”“史”的演变、沿革、发展作总体描述，从而揭示出可资今人借鉴、发展民族文学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因此它要求拥有可信的第一手思想素材，要求资料的整一性和真实性。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开发、深化和创新，离不开研究理论方法的提升与原理范式的探讨。某种新的研究理念和理论思路，有助于重新理解与发掘新的文学关系史料，而新的阐释角度和策略又能重构与凸显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图景，从而将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向新的深度开掘。早在新时期我国比较文学举步之时和复兴之初，我国前辈学者季羨林、钱锺书等就卓有识见地强调“清理”中外文学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它提到中国比较文学特色建设和拥有比较文

学研究“话语权”的高度。¹30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不断努力,在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钱锺书先生就提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季羡林在《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钱林森教授主持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曾经就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料工作是影响研究的基础》一文中强调:“我们一定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收集材料,在西方各国之间,在东方各国中的哲学观照和跨文化文学对话的观念与方法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与实践。其具体思路主要体现之间,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士的个人著作中去搜寻直接影响的证据,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据,决不能捕风捉影。在如下五个方面: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他明确反对“那些一无基础,二无材料,完全靠着自己的‘天才’、‘灵感’,率而下笔,大言不惭,说句难

1) 依托于人类文明交流互补基点上的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课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外听的话,就是自欺欺人的所谓平行发展的研究”。参见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第9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哲学观、价值观交流互补的问题,是某一种形式的精神交流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研究中

外文化、文学相互影响,说到底,就是研究中外思想、哲学精神相互渗透、影响的问题,必须

作哲学层面的审视。2) 考察两者接受和影响关系时,必须从原创性材料出发,不但要考察外

国作家、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追寻,努力捕捉他们提取中国文化(思想)滋养,在其创

造中到底呈现怎样的文学景观,还要审察作为这种文学景观“新构体”的外乡作品,又怎样反

转过来向中国文学施于新的文化反馈。3) 今日中外文学关系史建构,不是往昔文学史的分支

研究,而是多元文化共存、东西哲学互渗时代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重构。比较不是理由,比

较中达到对话并且通过对话获得互识、互证、互补的成果,才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学理层面的

应有之义。4) 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课题,应以对话为方法论基点,应当遵循“平等对话”

的原则。对研究者来说,对话不止是具体操作的方法论,也是研究者一种坚定的立场和世界观,

一种学术信仰,其研究实践既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跨时空跨文化的对话,也是研究者与潜在的

读者共时性的对话,通过多层面、多向度的个案考察与双向互动的观照、对话,激活文化精魂,

进一步提升和丰富影响研究的层次。5) 对话作为方法论基点来考量的意义在于,它对以往“影

响研究”、“平行研究”两种模式的超越。这对所有致力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者来说,都是

一种富有创意的、富有挑战性的学术探索。

从学术史角度看,同一课题的探讨经常表现为研究不断深化、理路不断明晰的过程。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已有多年的历史,具有丰厚的学术基础。《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的又一次推进,具有更高标准的理论追求。钱林森主编在2005年编委会上将丛书的学术宗旨具体表述为:

丛书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双向多层次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中,把握中外文学

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1) 外国作家如何接受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如何对外国作家产生冲击与影响？具体涉及到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收纳与评说，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误读、误释，中国文学在外国的流布与影响，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与异国情调等等。2)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作家如何接受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接纳外来影响时的重整和创造，进行双向的考察和审视。3) 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展示出中外文学家就相关的思想命题所进行的同步思考及其所作的不同观照，可以结合中外作品参照考析，互识、互证、互补，从而在深层次上探讨出中外文学的各自特质。4) 从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尤其是 20 世纪）中的传播与接受着眼，试图勾勒出中国读者（包括评论家）眼中的外国形象，探析中国读者借鉴外国文学时，在多大程度上、何种层面上受制于本土文化的制约，以及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范式中的改造和重整。5) 论从史出，关注问题意识。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提炼出展示文学交流实质与规律的重要问题，以问题剪裁史料，构建各国别语种文学交流史的阐释框架。6) 丛书撰写应力求反映出国际比较文学界近半个世纪相关研究成果和我国比较文学 20 多年来发展的新成果。

四

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从事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要求我们要有所反思与开辟。这是该丛书从规划到研究，再到写作，整个过程中贯穿的思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涉及基本概念、史料与研究范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基本概念。

中外文学关系，顾名思义，研究的是“关系”，其问题的重心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在此前提下进行细分，所谓中外文学关系的历史叙述，应该在三个层次上展开：1) 中国与不同国家、地区、语种文学在历史中的交流，其中包括作家作品与思潮理论的译介、作家阅读与创作的“想象图书馆”、个人与团体的交游互访等具体活动等。2) 中外文学相互影响相互创造的双向过程，诸如中国文学接受外国文学并从与外国文学的交流中获得自我构建与

自我确认基础，中国文学以民族文学与文学的民族个性贡献并参与不同国家、地区、语种文学创造等。3) 存在于中外文学不同国家、地区、语种文学之间的世界文学格局，提出“跨文学空间”的概念，并将世界文学建立在这样一种关系概念上，而不是任何一种国家、地区、语种文学的普世性霸权上。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外文学”的关系，另一个必须厘清的概念是“中外文学”：1) 中外文学关系不仅是研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不同国家、地区、语种文学各自的文学史，比如研究法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真正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反之亦然。2) 中外文学关系在“中”与“外”二元对立框架内强调双向交流的同时，也不能回避中国立场。首先，中外文学研究表面上看是双向的、中立的，实际上却有不可否认的中国立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中心。因此“中外文学”提出问题的角度与落脚点都应是中国文学。3) 中国立场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指归在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它包括两个层次的意义：中国在历史上是如何启发、创造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是如何构筑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的。

中外文学关系基本概念涉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史”。中外文学关系史属于文学史的范畴，它关系到某种时间、经验与意义的整体性。纯粹编年性地记录曾经发生过的文学交流事件，像文学旅行线路图或文学流水账单之类，还不能够成为文学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史”的最基本的要求在于：1) 文学交流史必须有一种时间向度的研究观念，以该观念为尺度，或者说是编码原则，确定文学交流史的起点、主要问题、基本规律与某种预设性的方向与价值。2) 可能成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观念的，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中国文学是何时、如何参与、如何接受或影响世界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是何时并如何塑造中国文学的。3) 中外文学交流史表现为中国文学在中外文学交流中实现世界性与现代性的过程。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分两个阶段，汉字文化圈内东亚化与近代以来真正的世界化，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是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同时出现的。

其次是史料问题。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史料的丰富与准确程度。史料是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丰富是量上的要求；史料需要辨伪甄别，尽量收集第一手资料，这是对史料的质上的要求。史料自然越丰富越好，但史料的发现往往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史料的丰

富与完备是相对的,关键看它是否可以支撑起论述。因此,研究中处理史料的方式,不仅是收集,还有在特定研究观念下剪裁史料、分析史料。

没有史料不行,仅有史料又不够。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在国内,已有多年的历史,但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史料的收集与叙述上,丛书要在研究上上一个层次,就不能只满足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叙述。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与写作应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掌握资料来源并尽量收集第一手的资料,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阐释,从中发现一些最基本的“可研究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编年史式资料复述,其中没有逻辑的起点与终点,发现的最早的资料就是起点,该起点是临时的,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不断向前推,重点也是临时的,写到哪里就在哪里结束。第三个层次是使文学交流史具有一种“思想的结构”。在史料研究基础上形成不同专题的文学交流史的“观念”,并以此为线索框架设计文学交流史的“叙事”。

最后,中外文学交流研究的第三大问题是研究范型。学术创新的途径,不外乎新史料的发现、新观念与新的研究范型的提出。

研究范型是从基本概念的确立与史料的把握中来的。问题从何处来,研究往何处去。研究模式包括基本概念的确立、史料的收集与阐发、研究方法的选择等内容。任何一项研究,都应该首先清醒地意识到研究模式,说到底,就是应该明确“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研究的基本概念划定了我们研究的范围,而从史料问题开始,我们已经在思考“如何研究”了。

中外文学交流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研究领域,必须自觉到撰写原则或述史立场:首先应该明确“研究什么”。有狭义的文学交流与广义的中外文学交流。狭义的文学交流,仅研究文学与文学的交流,也就是说文学范围内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交流,更多属于形式研究范畴,诸如英美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词、《雷雨》与《俄狄浦斯王》;广义的文学交流史,则包括文学涉及的广泛的社会文化内容,文本是文学的,但内容和问题远超出文学之外,比如“启蒙作家的中国文化观”。本书的研究范围,无疑属于广义的中外文学交流。所谓中外文化交流表现在文学活动中的种种经验、事实与问题,都在研究之列。

但是,我们不能始终在积极意义上讨论影响研究,或者说在积极意义上使用影响概念,似乎影响与交流总是值得肯定的。实际上,对文学活动中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现有两种范型:

一种是肯定影响的积极意义的研究范型,它以启蒙主义与现代民族文学观念作为文学交流史叙

事的价值原则，该视野内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一种文学传统内作家作品与社团思潮如何译介、传播到另一种文学传统，关注的是不同语种文学可交流性侧面，乐观地期待亲和理解、平等互惠的积极方面，甚至在潜意识中，将民族主义自豪感的确认寄寓在文学世界主义想象中，看中国文学如何影响世界。我们以往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大多是在这个范型内进行的。另一种范型关注影响的负面意义，解构影响中的“霸权”因素。这种范型以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观念为价值原则，关注不同文学传统的不可交流性、误读与霸权侧面。怀疑双向与平等交流的乐观假设，比如特定文学传统之间一方对另一方影响越大，反向影响就越小，文学交流往往是动摇文学传统的霸权化过程；揭示不同语种文学接触交流中的“背叛性”因素与反双向性的等级结构，并试图解构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机制。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开发、深化和创新，离不开研究理论方法的提升与原理范式的研讨。某种新的研究理念和理论思路，有助于重新理解与发掘新的文学关系史料，而新的阐释角度和策略又能重构与凸显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图景，从而将中外文学关系的“清理”和研究向新的深度开掘。以往的中外文学交流研究，关注更多的是第一种范型内的问题，对第二种范型内的问题似乎注意不够。丛书希望能够兼顾两种范型内的问题。“平等对话”是一种道德化的学术理想，我们不能为此掩盖历史问题，掩盖中外文学交流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应分析其霸权与压制、他者化与自我他者化、自觉与“反写”（Write Back）的潜在结构。

同时，这也让我们警觉到我们的研究范型中可能潜在着一个矛盾：怎能一边认同所谓“中国立场”或“中国中心”，一边又提倡“世界文学”或“跨文学空间”？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对立？实际上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前提下叙述中外文学交流，中国文学本身就处于某种劣势，针对西方国家所谓影响的“逆差”是明显的。比如说，关于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我们可以以一个专题写成一本书，而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则是覆盖性的，几乎可写成整部文学史。我们强调“中国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反写”。另外，文学史述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别民族文学的普世立场。启蒙神话中的“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或许提倡“跨文学空间”更合理。我们在“交流”或“关系”这一“公共空间”内讨论问题，假设世界文学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形成于跨文化跨语种的“文学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不仅西方文学塑造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构建塑造西方现代文学。尽管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学交流存在着“不平等”的现实，但任何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学都以自身独特的立场参与塑造世界文学，而世界文学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语种文学扩张的结果。

我们一直在试图反思、辨析、确立中外文学交流研究的基本概念、方法与理论范型，并在学术史上为本套丛书定位。所谓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的丰富、问题域的明确、问题研究的深入、中外文学交流整体框架的建构，都将是本套丛书的学术价值所在。我们希望本套丛书的完成，能够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走向成熟。这不仅是个人研究的自我超越问题，也是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界的自我超越问题。

五

钱林森教授将中外文学交流研究的问题细化为五大类，前文已述。这五大类问题构成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基本问题域，每一卷的写作，都离不开这五大类基本问题。反思这套丛书的研究与写作，可以使我们对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范型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在丛书写作的过程中，钱林森教授不断主持有关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笔谈，反思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基本问题与理论范式，大部分参与丛书写作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具有建设性的思考，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其中，王宁教授从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理解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认为：“探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外的接受和传播，应该是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打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内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使得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大大地提升，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先行一步。”王宁先生高蹈，叶隽先生务实，追问作为科学范式的文学关系研究的普遍有效性问题，他从三个方面质疑比较文学学科的合法性：一是比较文学的整体学术史意识，二是比较文学的思想史高度，三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的“文史根基”与方寸。葛桂录教授曾对史料问题做过三方面的深入论述：一是文献史料，二是问题域，三是阐释立场。“从比较文学学科的传统研究范式来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属于‘影响研究’

范畴，非常关注‘事实材料’的获取与阐释。就其学科领域的本质属性来说，它又属于史学范畴。而文献史料的搜集、鉴辨、理解与运用，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力求广泛而全面地占有史料，尽可能将史料放在它形成和演变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考察，分辨其主次源流，辨明其价值与真伪，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永远的起点和基础。”缺少史料固然不行，仅有史料又十分不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问题意识”必不可少，问题是研究的先导与指南。葛桂录教授进一步论述：“能否在原典文献史料研究基础上，形成由一个个问题构成的有研究价值的不同专题，则成为考量文学关系研究者成熟与否的试金石。在文学关系研究的‘问题域’中进而思考中外文学交往史的整体‘史述’框架，展现文学交流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揭示出可资后人借鉴、发展本民族文学的重要路径，又构成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基本目标。”

文献史料、问题域、阐释立场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三大要素。文献史料的丰富、问题域的确证、研究领域的拓展、观念思考的深入，最终都要受研究者阐释立场的制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理论上讲当然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但如要追寻这种双向交流的精神实质，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种主体评价与判断。对中国学者来说，就是展现着中国问题意识的中国文化立场。“中外文学”提出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指向中国文学。这样看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关注点，在于回答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学（文化）在漫长的东西方交流史上是如何滋养、启迪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是如何激活、构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的。这是我们思考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重要前提，尤其是要考虑处于中外文学交流进程中的中国文学是如何显示其世界性，构建其现代性的。

六

乐黛云先生在致该丛书编委会的信中，提出该丛书作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第三波”的高标：“如果说《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是第一波，《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是第二波，那么，《中外文学交流史》则应是第三波。作为第三波，我想它的特点首先应体现在‘交流’二字上。它不单是以中国文学为核心，研究其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只是以外国作家为核心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而是要着眼于‘双向阐发’，这不仅要求新的视角，也要求新的方法；特别是总

的说来，中国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多集中于古代文学，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集中于现代文学。如何将二者连缀成‘史’实在是一大难点，也是‘交流史’能否成功的关键。”

本套丛书承载着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学术史的重要使命，它的宏愿不仅在描述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学关系，还在以汉语文学为立场，建构一个“文学想象的世界体系”。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要点在“文学交流”，因此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双向阐发”，带着这个问题进入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译介、传播的问题，中外文学相互认知、相互影响与创造才是问题的关键。严绍璁先生在致主编钱林森的信中，进一步表达了他对本丛书的学术期望，文学交流史研究应该“从一般的‘表象事实’的描述深入到‘文学事实’内具的各种‘本相’的探讨和表达”：

我期待本书各卷能够是以事实真相为基础，既充分展现中华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又能够实事求是地表述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丰富多样性的积极的影响，把“中外文学关系”正确地表述为中国和世界文化互动的历史性探讨。“文学关系”的研究，习惯上经常把它界定在“传播学”和“接受学”的层面上考量，三十年来比较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实上已经突破了这样一些层面而推进到了“发生学”、“形象学”、“符号学”、“阐释学”和“叙事学”等等的层面中。在这些层面中推进的研究，或许能够更加接近文学关系的事实真相并呈现文学关系的内具生命力的场面。我期待着新撰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各卷，能够从一般的“表象事实”的描述深入到“文学事实”内具的各种“本相”的探讨和表达。

2005年南京会议之后，丛书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国内著名学者吕同六、李明滨、赵振江、郁龙余、鄧溥浩、王晓平等先生慷慨加盟，连同其他各位中青年学者，共同分担《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的写作。吕同六先生曾主持中意文学交流卷，却在丛书启动不久仙逝，为本丛书留下巨大的遗憾。在丛书编写过程中，有人去了有人来，张西平、刘顺利、梁丽芳、马佳、齐宏伟、杜心源、叶隽先生先后加入本套丛书，并贡献出他们出色的成果。

在整个研究写作过程中，国内外许多同行都给予我们实际的支持与指导，我们受用良多。南京会议之后，编委会又先后在济南、北京、厦门、南京召开过四次编委会，就丛书编写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得到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一贯支持。丛书最初计划五年的写作时间，当时觉得

已足够宽裕，不料最终竟然用了九年才完成，学术研究之漫长艰辛，由此可见一斑。丛书完成了，各卷与作者如下：

- (1) 《中国 - 阿拉伯卷》（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 著）
- (2) 《中国 - 北欧卷》（叶隼 著）
- (3) 《中国 - 朝韩卷》（刘顺利 著）
- (4) 《中国 - 德国卷》（卫茂平、陈虹嫣等 著）
- (5) 《中国 - 东南亚卷》（郭惠芬 著）
- (6) 《中国 - 俄苏卷》（李明滨、查晓燕 著）
- (7) 《中国 - 法国卷》（钱林森 著）
- (8) 《中国 - 加拿大卷》（梁丽芳、马佳 主编）
- (9) 《中国 - 美国卷》（周宁、朱徽、贺昌盛、周云龙 著）
- (10) 《中国 - 葡萄牙卷》（姚风 著）
- (11) 《中国 - 日本卷》（王晓平 著）
- (12) 《中国 - 希腊、希伯来卷》（齐宏伟、杜心源、杨巧 著）
- (13) 《中国 - 西班牙语国家卷》（赵振江、滕威 著）
- (14) 《中国 - 意大利卷》（张西平、马西尼 主编）
- (15) 《中国 - 印度卷》（郁龙余、刘朝华 著）
- (16) 《中国 - 英国卷》（葛桂录 著）
- (17) 《中国 - 中东欧卷》（丁超、宋炳辉 著）

本套丛书的意义，就在于调动本学科研究者的共同智慧，对已有成果进行咀嚼和消化，对已有的研究范式、方法、理论和已有的探索、尝试进行重估和反思，进行过滤、选择，去伪存真，以期对中外文学关系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和全方位的开发，创造出新的局面。

钱林森、周宁

前言

1998年，澳门即将回归中国的前一年，葡萄牙导演若泽·奥利维拉（José Carlos Oliveira）在澳门拍摄根据葡萄牙知名作家安杰业（João Aguiar）同名小说改编的五集电视剧《烟龙》（*Dragão de Fumo*），他邀请从未演过戏的我饰演剧中的华人医生严国文。我糊里糊涂地接受了邀请，我想我的演出是糟糕的，以至于我惭愧地没有看过自己的表演录像，但我还依稀记得那个场景：严国文医生不惧黑社会射来的子弹，舍身救美，于是从里斯本来澳门教书的葡萄牙女教师丽达幸免一死，俩人模棱两可的恋情经过危难的洗礼也获得了延续下去的基础。在丽达的父亲阿德里诺看来，女儿俘获了一条“烟龙”。华人医生严国文和葡萄牙女教师是否可以战胜种种困难和障碍而进入心心相印的境界呢？影片的结局是浪漫的，但彼此的交流是困难的，前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由此，我不由地想到中葡两个国家和民族的交往。

葡萄牙是最早与中国进行交往的欧洲国家之一，而且曾在澳门进行过长达400多年的殖民或者说准殖民统治；在弹丸之地的澳门，两个民族鸡犬相闻，朝夕相处，但又各自为政，鲜有密切的来往和深切的交流，双方始终没有做到真正地相互了解，更遑论心有灵犀了，诚如曾经对18、19世纪生活在澳门的族群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潘日明（Benjamin Videira Pires）神父所描述的：“葡萄牙和中国两个社会隔墙相望，和睦共存。”¹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只是“和谐共存”而已，并没有做到相互促进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对澳门历史研究深有心得的吴志良博士这样概括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

澳门历史的双轨——道德和价值观的双重标准，虽造就了一个潜在的文化冲突的世界，但是华洋依然可以共处分治，和睦相邻，其根本原因仍在于双轨保持长期均衡平行。换言之，华洋社群在澳门共存数百年而未有发生致命的危机，是由于两种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观没有产生真正的交融和正面剧烈的冲突，在一种近乎完美的双轨单行模式中发展并进。假如这种分析正确的话，又如何解释“澳门是中西文化最恒久的交汇点”这一似是似非的共识？²

1. 潘日明：《殊路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苏勤译，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197页。

2. 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年，第66页。